

August Conrady · 鹽谷溫 · 魯迅

——論環繞《中國小說史略》的一些問題

陳勝長

一 引言

魯迅（1881—1936）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受注目的一位作家，「魯迅研究」也可說是今之顯學。就國內的情況來說，研究的成績主要在傳記材料和小說、雜文的寫作背景方面。一旦討論到作品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則每多雷同一響。不過魯迅也是一位文學史家，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以下簡稱《史略》），如今已有注釋本行世，¹但其它的有關研究卻還不多見²。魯迅的《史略》曾受日人鹽谷溫（1878—1962）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一書影響，研究魯迅的人自然都知道，可是至今還沒有人對此問題作較詳細的討論。至於《講話》一書，在當時的日本遠遠超越同類型的漢學著作，其成功之處，與吸收了德國漢學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受了漢學家 August Conrady（1864—1925）的影響不無關係。《史略》雖受《講話》的影響，但在材料的取舍與解釋方面，和《講話》的小說部分頗有不同，後來鹽谷溫將《講話》一書重新修訂，並且改名《支那文學概論》，小說部分除了增加不少新的內容外，也採用了一些魯迅的意見。本文的寫作目的，除了補充說明一段較少人討論的德國漢學與日本漢學的因緣外，主要是就小說研究方面探討一下鹽谷溫、魯迅兩人之間的相互影響。

1 198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魯迅全集》十六卷本，《中國小說史略》收入第九卷，有注釋。另1979年同社曾出版《中國小說史略》的「徵求意見本」，注釋較龐雜，或即十六卷本的初稿。

2 就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魯迅研究資料索引》（人民文學出版社，上冊1982年版，下冊1980年版）來看，上冊所收1949年9月以前關於《史略》的文章不過四篇（見頁248、250、274、279），下冊所收1949年10月至1965年6月的亦不過13篇（見頁258至259）。近年除了一些單篇論文外，又出現了兩種專著，一是儲大泓的《讀〈中國小說史略〉札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一是許懷中的《魯迅與中國古典小說》（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與其他連篇累牘的魯迅研究資料相較，未免顯得薄弱了。

二 《講話》與《史略》的成書過程和譯本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最初於大正八年（1919）由講談社的前身大日本雄辯會出版。這書的底本是大正六年（1917）鹽谷溫在東京文科大學六次夏季公開講演的筆記，經一年半的修訂增補而成。其中以敘述戲曲，小說的發展最見功力，可補當時日本漢學界在這方面研究的缺陷。而小說一章，論述尤詳，凡193頁，佔全書篇幅的35%強。

《講話》全書或其中的小說部分都先後出現過不同的中譯本。1921年上海中國書局出版了署名古吳郭希汾「編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此書與魯迅所作同名而出版年代略早，據本書序言，知其實為「譯自日人鹽谷溫所著《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之一節」。又說「是書著自口人，頗病冗沓，遂為汰其膚辭，撮其精要，其有不合吾國國情之處，亦事刪節。」然則編著云云，當以改稱編譯為合。其後又有君左的譯本，題作《中國小說概論》，原載民國十六年（1927）《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早在1926年北京樸社已出版了全書的節譯本，由陳彬龢翻譯，書名《中國文學概論》；到了1929年，始有孫俤工的全譯本，書名《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鹽谷氏此書一直是他在大學講授「支那文學概論」這門功課的教材。昭和十二年（1937）鹽谷氏於東京大學退休，至昭和十七年（1942）始在門生內田泉之助的協助下，着手對全書改訂，行文從口語體改為書面語體，書名亦省去「講話」二字而變成《支那文學概論》，於昭和二十一年（1946）出版上篇，昭和二十二年（1947）出版下篇，由弘道館發行。原來《講話》一書只分六章，至是又於第一章〈音韻〉之後增〈文字〉一章為第二章，而以第七章〈小說〉別為下篇。昭和二十四年（1949）又曾將下篇改名為《中國小說の研究》單行發刊。至於昭和五十八年（1983）收入講談社學術文庫的《中國文學概論》，那不過是鹽谷溫的舊版《講話》，換了一個新名而已。

1920年，即《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出版後第二年，魯迅開始到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而所編的講義，便是《中國小說史略》的前身。那時的講義原名《小說史大略》，是油印本，凡十七篇。³ 其後續有增訂，並且改為鉛印，凡二十六篇。⁴ 至1923年12月始由北大第一院新潮社發行《中國小說史略》上卷，明年六月同社發行下卷，凡二十八篇。初版目錄在下卷之末，至1925年9月由北新書局發行再版合訂本，始將目錄移置在

3 由《社會科學戰綫》編輯部編，吉林人民出版社於1980年5月出版的《魯迅研究論叢》，發表了魯迅《小說史大略》的全文。（見《論叢》頁1—86）。又陝西人民出版社於1981年4月出版的《魯迅小說史大略》，亦是據油印本重排。

4 最先為文介紹講義鉛印本的，是路工〈從《中國小說史大略》到《中國小說史略》〉一文，（見1972年5月《文物》頁46—48）其時路工未知有油印本。油印本與鉛印本的不同，可參《魯迅小說史大略》所附單演義〈關於最早油印本《小說史大略》講義的說明〉和陸樹倫〈略談《中國小說史略》版本上的一些問題〉（見《魯迅研究論叢》）的有關討論。

正文之前，⁵至1931年又由北新書局出版「訂正本」，據新加的〈題記〉，說是僅於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訂」。1935年第十版時又曾再作輕微修改，以後各版均與第十版同。⁶

《史略》上卷出版後不久，當時北京極東新信社發行的日文雜誌《北京週報》（The Peking Weekly）曾經加以譯載，譯文仍題作「中國小說史略」，下署「北京大學教授魯迅氏著」。至第137號（1924年11月16日出版）已譯載至上卷第十五篇〈明之講史〉論《北宋三遂平妖傳》一節，此節於後來之訂正本改隸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而初版在第十五篇，已是《史略》上卷之末，只需再譯載一至二期，即可將《史略》上卷全部譯完，未知何故忽而中斷。⁷至於《史略》的全譯本，則要到1935年（昭和十年）始由增田涉譯成，譯本改名《支那小說史》，由三上於菟吉主持的サイレン社出版，1938年又改由大正堂出版。以後增田涉又曾將譯文修訂，分為上、下兩卷，收入岩波文庫，分別於1941年9月、1942年12月出版。至1962年仍由岩波書店合為一冊出版。⁸

以上是《講話》和《史略》兩書的成書過程、各種版本和譯本的大概。

三 《講話》所受德國漢學的影響

《講話》一書出版之前，日本漢學家絕少注意我國的戲曲小說，即有論述，亦甚簡略。如明治三十年（1897）五月出版古城貞吉的大著《支那文學史》，可說是傳世同類著作的嚆矢。全書734頁，所論只限於詩文。至明治三十五年（1902）再版，於書末增加〈餘論〉一章，始有三段論及小說戲曲的文字，所佔篇幅，不過四頁，可說是保守派漢學家的代表。⁹同在明治三十年，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出版後一個月，則有笹川種郎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問世，除附錄〈《金雲翹傳》梗概〉不計，全書不過159

5 此合訂本於目錄之前有一段魯迅新加的附識，書後又有正誤表三頁。

6 關於《史略》的編撰和改訂經過，陸樹倫一文（見註4）論之最詳。

7 本人所見之《北京週報》，乃日本東洋文庫藏，從第119號（1924年7月6日出版）開始，那時《中國小說史略》已續譯載至第九篇〈唐之傳奇文（下）〉之「宋朱熹（《楚辭辨證》中）嘗斥僧伽降伏無之邪事為悞說」以下之文字。而第137號之後《史略》的譯文即告中止。不過在第141號又有署名「東方生」所譯魯迅的「私の鬚」，即後來收入《墳》中的〈從鬚鬚說到牙齒〉一文。

8 據日本人辛島驍〈回憶魯迅〉一文（見1984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資料》第13輯，頁207—215，任鈞譯），魯迅曾答應由辛島驍將《史略》譯成日文。後來才改由增田涉來譯。（頁211—212）

9 按新加的〈餘論〉凡十頁，共分九節，最後的三節為《儒教主義と小説との關係》、〈元曲の發達〉和〈王君子の小説觀〉。古城貞吉以為傳奇小說多唱亂誨淫，執筆者多為性行卑劣之徒，故此種著作向為士君子擯斥於文學以外，實非偶然云云。（頁584）

頁，所論自元至清小說，僅《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樓夢》、《十二樓》數種而已。笹川種郎又寫了一本《支那文學史》，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版，凡315頁，中論元明清小說各節，皆採自舊著《支那小說戲曲小史》而益簡略，所佔篇幅，總計不過八頁。他如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1903）、兒嶋獻吉郎的《支那文學史綱》（1912），論及小說各節，亦均甚簡略。這種現象，是和中國文學重視詩文，輕視戲曲小說的傳統相一致的。

鹽谷溫出身儒學世家，明治三十五年（1902）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學科。隨入東大研究院，專攻中國文學，從森槐南學詞曲小說。明治三十九年（1906）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助教授。同年十二月赴德國研究中國文學，先至慕尼黑，一學期後轉赴萊比錫，隨August Conrady從事研究。明治四十二年（1909）秋到中國，居北京一年，得識王國維。後轉赴長沙，從葉德輝習戲曲。至大正元年（1912）八月始回日本。¹⁰鹽谷氏以《元曲研究》的論文於大正九年（1920）獲得文學博士，但終其一生對中國小說的研究，業績決不在戲曲之下。1919年《講話》的出版，可說是日本漢學研究的劃時代著作。1946年鹽谷溫在此書的修訂本（即《支那文學概論》）的自序中說：

從來我國（按：指日本）先儒對中國文學之研究，以古典為主，不出詩與文章。反之西洋之漢學家則從語學入手，而有偏重通俗文學之傾向。¹¹

《講話》一書特重戲曲小說，那顯然是受了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所以把戲曲小說和詩歌、散文同等看待加以論列。鹽谷溫於自序中又說他在德國時跟西方學者學習文學研究法。就《講話》的小說部分言，辛島驍以為其中的第一節〈神話傳說〉正是鹽谷氏留德時受到嶄新看法啟迪的成果。¹²將小說的起源追溯到神話傳說，其實早在明治十八年（1885）坪內雄藏（逍遙）的名著《小說神髓》中已有論及。逍遙以為小說之一的所謂「奇異譚」（romance）即起源於上古的神話。他的見解主要是受了英國文學和有關的理論的影響。¹³不過到了明治中期以後，日本在外國思想文化的攝取上，所得於德國實在遠出英、美、法等國之上。明治時期介紹西方文學和有關思想最有貢獻的森鷗外，便是在明治十七年（1884）至二十一年（1888）留學德國的。而政府派往德國留學的學生，

10 關於鹽谷溫之生平資料，參攷鹽谷先生紀念會刊行之《鹽谷先生紀念會誌》（1939年8月）及《東京支那學報》第九號（1963年6月）之〈鹽谷節山先生年譜〉及〈鹽谷節山先生さ偲ぶ〉中之悼念文字。

11 《支那文學概論自序》頁2。

12 辛島驍：〈先生の小説研究〉，見《東京支那學報》第九號，頁31。

13 參攷川副國基：〈《小説神髓》について——文學革新期と英國の評論雜誌〉，筑摩書房版《現代日本文學大系》第一集，頁410；又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eiji Era* (Ōbunsha, 1955) 頁609—612。

人數也較派往其它西方國家者為多。¹⁴鹽谷溫則是明治四十年代初期的德國留學生，他在《講話》的第六章第一節〈神話傳說〉中記述了在德國時聽August Conrady 講課的一段有趣經歷：

在現存的先秦的書中，多保留有神話傳說，欲求一小說底先驅則不能不先推《楚辭》底〈天問〉篇和《山海經》。……在晉傅玄底〈擬天問〉裏也說「月何所有，白兔搗藥。」在李白底〈飛龍引〉裏更據此而說「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憶在萊比錫大學聽康拉第教授（按：日文原作コンラデー教授，即Conrady的音譯）底《楚辭》講義的時候，教授曾畫一兔以杵搗臼之圖於黑板上，很博得聽講者底喝采。我們不見得以為怎樣稀奇的在西洋底學生却很感着興趣。還有，教授附帶地說及在印度也有同樣的思想。把中國、印度、埃及、希臘等神話比較地研究一下，恐怕是很有興趣的罷。¹⁵

August Conrady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也是比較語言學家。大學時專研印度日爾曼語，其後研究範圍擴大，留心尼泊爾語及其它印度支那語系。1891年任教於萊比錫大學。他對研究梵文的興趣逐漸被古代漢語所代替，並且留心探究中國文化的來源以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互關係。1903年更到了中國的北京大學講學，在啟程之前，還出版了《中國的文化與文學》（*Chinas Kultur und Literatur*）。Conrady 於1904年離開中國，回到萊比錫，便將這次經歷寫成了《在北京的八個月》（*Acht Monate in Peking*），於1905年出版。到了1906年又發表了〈公元前四百年中國所受的印度影響〉（“Indischer Einfluss in China im 4. Jahrhundert v. Chr.”），文中除討論到莊子和老子所受的印度影響外，又花了很多篇幅討論屈原的〈天問〉，其中說到月中有兔的故事是淵源自《本生經》（*Jātaka*）的。¹⁶鹽谷溫正好在Conrady 此文發表後不久便到了萊比錫，所以有機會看到Conrady興緻勃勃的在黑板上畫月兔搗藥圖了。¹⁷

14 參攷大塚三七雄：《明治維新と獨逸思想》，長崎出版，1977年版。

15 《講話》頁351—352；譯文據孫譯本頁315。

16 見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1906) 第60卷，頁346。按巴利文《本生經》（*Jātaka*）共收547個故事，其中第316個為〈兔本生〉（“*Sasajātaka*”）。Vilhelm Fausböll曾將全書用羅馬字母對譯出來，凡六冊，1877年出第一冊，至1896年出第六冊。

17 按聞一多在〈天問釋天〉一文（原載《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1936年1月。其後收入《聞一多全集》第二冊，頁313—338）曾把「顧兔」解釋為「蟾蜍」。季羨林以為不合傳統說法，並且說月兔之說在中國雖是山來已久，其實來自印度。除了舉《本生經》第316個故事和其他一些中譯佛經中把兔子和月亮聯繫起來的故事作證外，又指出從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Rgveda*）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中有兔。而許多意思是月亮的梵文字都有śaśa（兔子）這個字作為組成部分。（詳見季羨林1958年作的〈印度文學在中國〉一文，三聯版《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頁12—122。）

關於August Conrady的生平和學術成就，Erich Schmitt在1926年出版的*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F. 3)上發表了一篇題作“August Conrady”的悼念文字，其中有很清楚的介紹。August Conrady生前發表的論著，不過是他的部分研究成果，還有大量文稿沒有發表。即如他對〈天問〉的研究，便由Eduard Erkes根據他的未發表文稿整理完成，到1931年才出單行本，題作《中國藝術史上最早的文獻：屈原的〈天問〉》(*Das älteste Dokument zur chinesischen Kunstgeschichte: T'ien-wen 天問, die "Himmelsfragen" des K'ü Yüan*)。此外Bruno Schindler又曾於1926年出版的*Asia Major*第3號上發表〈August Conrady的學術遺產：在漢學研究方法上的貢獻〉(“Der wissenschaftliche Nachlass August Conradys, ein Beitrag zur Methodik der Sinologie”)文中提到August Conrady未發表的遺稿凡390種，計關於語言學的59種，語法學的69種，文學史的88種，文字學的16種，宗教史學的14種，歷史學和文化史學的105種。在文學史研究的各種遺稿中，編號第70至第78各篇是關於〈天問〉的，這一系列文章即日後Eduard Erkes整理完成〈天問〉研究專著所根據的原始材料。¹⁸此外編號第79和第80是關於寓言一類的研究。而在宗教史方面的遺稿中，第1至3號均為神話學的研究，第6號為〈書經中的神話〉(“Mythologisches in *Shu-king*”)，第13號為〈中國的傳說〉(“Chinesische Sagen etc.”)我們雖然不能知道這些文稿的內容有多少是鹽谷溫在課堂上曾經聽過的。但起碼在神話學方面鹽谷氏吸收了德國漢學研究的一些成果，並且應用到小說研究方面去，一如他的受業婿辛島驍所言，該是毫無疑問的吧。

《講話》一書的另一特色，就是從語學入手來討論中國文學，第一章〈音韻〉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暢論中國語音的特點，不但是前此的日本漢學著作而無，亦不見於Herbert A. Giles於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至於Wilhelm Grube於1902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首章雖亦稍涉語音問題，但遠不如《講話》的詳細。《講話》首章一開始即引用了德國學者Prof. Gabelentz的*Chinesische Grammatik* (孫譯作《漢文經緯》)，而鹽谷氏對語言學的知識，顯然也是受作為語言學家的August Conrady所啓迪的了。

四 《講話》對《史略》的影響

魯迅的《史略》出版後，陳源批評說是鈔襲鹽谷溫《講話》一書的小說部分。¹⁹魯

18 見*Das älteste Dokument zur chinesischen Kunstgeschichte: T'ien-wen 天問* (Leipzig, 1931) IV的編者前言。

19 參《現代評論》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陳源的〈閒話〉和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上陳源〈致志摩〉的公開信。兩文於1958年版《魯迅全集》註釋本卷3，頁497，註22中均見徵引。

迅於是在1926年2月寫了一篇〈不是信〉（見《華蓋集續編》），文中有如下的申辯：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裏；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捨，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

我們不妨就這段文字所提到的問題重新考察一下。

首先要討論的是《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雖然魯迅承認本章是根據《講話》，但並不表示意見和鹽谷溫的完全相同。《史略》的前身是《小說史大略》，第二篇也是〈神話與傳說〉，其中有如下的議論：

故中國之神話與傳說，至今僅有叢殘之文。說者謂此其故有二：一、華夏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非玄想，不能集古傳以成人文。二、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然按其實，或當在神鬼之不別。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鬼亦能為神祇。人神淆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原始信仰存則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而舊有者於是如故，亦於是散亡。²⁰

所謂「說者」云云，蓋指鹽谷溫《講話》中的看法。²¹但魯迅並不同意，而另外提出「神鬼不別」這一點。魯迅以為「人神淆雜」即仍有原始信仰的色彩，尚不失為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一種見解。²²不過即使「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如何便可得出舊有的傳說「於是如故，亦於是散亡」的結論呢？魯迅也許亦覺得有欠斟酌，所以在初版的《史略》將此段文字作了不少的改動：

(1)將「然按其實，或者當在神鬼之不別」改為「然詳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遂由懷疑鹽谷溫的說法變成補充說明另一點更重要的原因。

20 見《社會科學戰綫》編輯部編《魯迅研究論叢》頁9；又陝西人民出版社版《魯迅小說史大略》頁12。

21 見《講話》頁348-349；孫譯本頁312-313。

(2)將「而舊有者於是如故，亦於是散亡」改為「而舊有者於是僵死，新出者亦更無光燄也」。但所謂「新」和「舊」的時代斷限究竟是怎樣呢？《史略》舉了五個例子，以說明如何「隨時可生新神」和「舊神有轉換而無演進」。除了一條是《論衡》所引《山海經》的材料外，全是晉(?)以後的材料。²³又如何可以用來解釋先秦神話傳說「所以僅存零星」呢？

《史略》第二篇自1923年初版以來，一直沒有修改。不過1924年7月魯迅在西安暑期講學時的講稿，即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對中國古代的神話材料又有不同的看法：

總之中國古代的神話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斷片的，沒有長篇的，而且似乎也並非後來散亡，是本來的少有。我們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為最要的有兩種：

一、太勞苦 因為中華民族先居在黃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並不佳，為謀生起見，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實際，輕玄想，故神話就不能發達以及流傳下來。勞動雖說是發生文藝的一個源頭，但也有條件：就是要不過度。勞逸均適，或者小覺勞苦，才能發生種種的詩歌，略有餘暇，就講小說。假使勞動太多，休息時少，沒有恢復疲勞的餘裕，則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麼文藝了。

二、易於忘却 因為中國古時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殺雜，則原始的信

22 關於中國神話銷歇的問題，1928年茅盾在其《中國神話研究A B C》中以為其中一個原因是「神話的歷史化太早，容易使得神話僵死。」其後楊寬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中亦以為「古史初為神話之說實不可移易。」（見《古史辨》第七冊上編，頁100）又對神話的演變與分化作了詳細的考察。不過法國漢學家馬伯樂 Henri Maspero 早於1924年寫了一篇〈書經中的神話〉（“*Le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Journal Asiatique*, 202, pp. 1-100；1939年有馮沅君的中譯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文中批評到中國學者只會用“*euthemeristic method*”來解釋傳說。「為了要在神話裏找出歷史的核心，他們排除了奇異的，不像真的分子，而保存了樸素的殘滓。神與英雄於此變為聖王與賢相，妖怪於此變為叛逆的侯王和奸臣。這些穿鑿附會的工作所得者，依着玄學的學說（尤其是五行說）所定的年代先後排列起來，便組成中國的起源史。」（馮譯本頁1）他認為「書經中充滿着純神話而誤認作歷史的傳說。」前文已提到 August Conrady 的遺稿中有一篇也是談《書經》的神話的，其內容與 Maspero 的研究是否有相同之處，本人無從知道。但鹽谷溫討論神話傳說時沒有提到《書經》，也許那時鹽谷溫沒有聽過 Conrady 講《書經》的神話吧。但《講話》中提到孔子對一切太古荒唐不稽的傳說加以排斥，所以神話傳說只在道家、雜家的著作中保留。似乎也沒有注意到神話的歷史化這一問題。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是1926年他在廈門大學任教時所編的講義，雖亦從《尚書》講起，也沒有注意這個問題，不過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魯迅則主張神話演進為傳說，傳說再演進，則「正事歸為史；逸史即變為小說了。」

23 按《小說史大略》原來只舉三例，分別為伍子胥（見《論衡》）、蔣子文（見《搜神記》）、紫姑（見《異苑》）。至《史略》則刪去伍子胥之例，而以蔣子文、紫姑例「隨時可生新神」。復引《論衡》、《太平御覽》、《三教搜神大全》三段文字，以說明「舊神有轉換而無演進。」關於後三例的解釋，可參考下文所引《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的一段文字。

仰存於傳說者，日出不窮，於是舊者僵死，後人無從而知。如神荼，鬱壘，為古之大神，傳說上是手執一種葦索，以縛虎，且御凶魅的，所以古代將他們當作門神。但到後來又將門神改為秦瓊，尉遲敬德，並引說種種事實，以為佐證，於是後人單知道秦瓊和尉遲敬德為門神，而不復知神荼，鬱壘，更不消說造作他們的故事了。此外這樣的還很不少。²⁴

這裏所說的第一種原因，和鹽谷溫的說法基本相同。而第二種原因則是魯迅捨不得割棄的「人神殺雜」的原始信仰說。但對中國古代只有斷片的而沒有長篇的神話，又解釋為「並非後來散亡，是本來少有」了。無論如何，由鹽谷溫而魯迅將中國小說的起源追溯到神話傳說，那影響無疑是深遠的。²⁵

其次是關於小說材料的辨偽問題。

魯迅說「現有的漢人小說，他（鹽谷溫）以為真，我以為假」。其實是有點淆亂視聽的。因為鹽谷溫在論兩漢六朝小說時，雖是根據《漢魏叢書》所收的材料，但並不相信那是真的漢人小說。《講話》的第六章第二節討論了東方朔的《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班固的《漢武故事》、《漢武內傳》，郭憲的《別國洞冥記》，伶玄的《飛燕外傳》，每種都清楚說明是「出於假託」或「後人傳會」。至於不著撰人名氏的《雜事秘辛》，鹽谷溫又根據《四庫全書提要》斷為明楊升庵所偽作。²⁶未解魯迅寫〈不是信〉一文時何故厚誣鹽谷溫以自高身價，以掩天下人耳目？今考《史略》第四篇所運用的材料和所下的斷語，絕大部分同於鹽谷溫，只是多了討論《西京雜記》的一段，廁於全篇之末。²⁷馬幼垣〈論《中國小說史略》不宜注釋及其他〉一文有如下的批評：

《漢書·藝文志》內著錄的小說，早佚，《史略》別為一篇，談的都是後人依託之作。跟着下來，〈今所見漢人小說〉又是一篇，講的「蓋無一真出於漢人」。

24 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九卷，頁303—304。

25 按中國古代神話和傳說的資料較為零碎，本身並沒有具備小說結構的條件。而坊間所見用中文撰寫的中國小說史，大抵因襲《史略》，以為中國小說源於古代神話。

26 參《講話》頁364—381；孫譯本頁327—342。

27 鹽谷溫論兩漢小說，實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列次第。自《神異經》至《漢武洞冥記》皆云「舊本題漢（或後漢）某某撰」。而並皆以為偽託。《漢武故事》一卷，為《漢魏叢書》所無，而見於《四庫全書提要》，《講話》已加注明。《講話》一再徵引《四庫全書提要》，《史略》雖摭取《提要》之意而絕無說明議論之所從出。至於《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首列《西京雜記》，次列《世說新語》，以為敘述雜事之屬。鹽谷溫因受了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以為雜事之類不足以當所謂小說（Novel）傳奇（Romance），故不加論列。（此意鹽谷溫於論《唐代小說》時說得十分清楚，詳下文。）而魯迅囿於傳統之區分，故於漢人小說列《西京雜記》，並於六朝小說特闢一章專論《世說新語》，這牽涉到鹽谷溫與魯迅兩人對小說的不同看法。不過在修訂本的《支那文學概論》中鹽谷溫於論兩漢小說時又增加論《西京雜記》一段。於六朝小說則仍不論《世說新語》。

既然魯迅本人也不信這些是漢代作品，又為何拘泥而分配二篇給漢代。大可把這批托古之作拖後至魏晉六朝的範圍內。²⁸

所見誠然不錯。而魯迅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受了鹽谷溫《講話》一書的影響，並且加強了考據的氣味。文字膨脹了，只有把《講話》第二節第一項〈漢代小說〉的材料分作兩章去討論了。

此外，魯迅說《史略》論六朝小說的部分是根據自己的輯本，所指的是《古小說鈎沈》。那是魯迅1909年6月自日本歸國後開始輯錄的，至1912年5月到北京前經已輯成。²⁹共「輯周至隋散逸小說」三十六卷。³⁰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一文曾說：

豫才（即魯迅）因為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穫，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鈎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³¹

其實魯迅因為做過古小說的輯佚工作，所以他的《史略》不但在討論六朝小說時所運用的材料遠較《講話》豐富，而且於志怪小說之外，注意到《語林》、《郭子》、《世說》、《笑林》、《解頤》、《啟顏錄》等記人間言動的中國小說傳統。³²而其中的《語林》、《郭子》、《笑林》等書，魯迅均曾加輯錄，收在《古小說鈎沈》內。《古小說鈎沈》在魯迅死後才印出，但在魯迅生前似未經最後整理，既無輯例，也無序跋。³³根據日人前野直彬的研究，還有好些文字校勘、所據板本等不盡完備的處所³⁴，但魯迅對古小說

28 見《抖擻》第46期（1981年9月）頁34。

29 參林辰〈魯迅《古小說鈎沈》的輯錄年代及所收各書作者〉，見《文學遺產》第三輯（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頁385—387。

30 見《三閑集·魯迅譯著書目》。

31 見《瓜豆集》（1969年實用書局據民國廿六年宇宙風社版影印）頁223。

32 按《史略》於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後〉云：「記人間事者已甚古，列禦寇韓非有皆錄載，惟其所以錄載者，列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若為賞心而作，則實萌芽於魏而盛大於晉，雖不免追隨俗尚，或供揣摩，然要為遠實用而近娛樂矣。」可見魯迅以為真正的小說當遠離實用的目的，故論小說起源，僅及神話傳說而不提先秦之寓言。

33 其後發現署名周作人的〈古小說鈎沈序〉，在1912年2月的《越社叢刊》第一集上發表。其後編《魯迅全集補遺》時曾經收錄。參之以〈關於魯迅〉一文，魯迅當初想以周作人之名印行《古小說鈎沈》，則此序或本出於魯迅之手。

34 見前野直彬之〈魯迅《古小說鈎沈》の問題點——六朝小説の資料に關して——〉，原載《東洋文化》第41號（1966年3月），後收入《中國小説史考》（東京：秋山書店，1975）頁197—211。此文有前田一惠的中譯本，發表於《中外文學》第8卷第9期（1980年2月）頁84—99。譯文後另有王秋桂的〈校後記〉，可參看。

的研究工作，顯然是遠在同時的鹽谷溫之上的。

最後還要說說唐人小說的分類問題。

唐人小說的分類，魯迅說鹽谷溫根據森槐南，那也不盡正確。森槐南是鹽谷溫的老師，擅中國詩詞，並曾作《補春天傳奇》和《深草秋》傳奇二種，大受黃公度稱譽。³⁵鹽谷溫自言在東京大學研究院時從森槐南習詞曲小說，《講話》的小說部分，也一再提到槐翁其人。³⁶在論唐人小說的一節裏，鹽谷溫說森槐南因為不滿意《四庫全書提要》的小說分類，於是另行分類如下：

- (一) 別傳：關於一人一事的逸事奇聞（所謂傳奇小說）
- (二) 異聞瑣語：架空的怪談珍說
- (三) 雜事：史外的餘談，虛實相半，以補實錄所缺的。

至於鹽谷溫本人則以為第三類不足稱為小說，第二類則稍有小說材料，而唐人小說的精華則是第一類別傳。³⁷他又根據《唐人說薈》的材料，將森槐南之所謂「別傳」又細分為四類，即別傳、劍俠、艷情、神怪。³⁸並且詳加論述。對於森槐南歸入「異聞瑣語」類的如《杜陽雜編》、《酉陽雜俎》等則擱而不論。這是完全符合西方現代的小說觀念的。而魯迅的《史略》則將唐代小說分為單行的傳奇文、傳奇集、雜俎三項加以論述。所謂雜俎除包括《杜陽雜編》、《酉陽雜俎》外，還包括孫棻的《北里志》和范攄的《雲溪友議》一類作品，其實亦不過是森槐南所謂「異聞瑣語」和「雜事」兩類材料的混合體，仍然是間接受了鹽谷溫一書的影響。³⁹不過鹽谷溫將傳奇文按其性質分作四類，魯迅則不復分類，以為「尚不離於搜奇記逸」。而「搜奇」和「記逸」之作，在《小說史大略》中本來分作兩篇論述，其後寫《史略》時因材料增益，舉例亦大抵按作者時代之先後為次第，便不再以「搜奇」，「記逸」為區分了。⁴⁰

根據以上的考察，我們只能說魯迅的《史略》有很多地方以《講話》為藍本，而絕不能說成是整大本的剽竊。陳源的批評是不負責任的，難怪魯迅到了晚年談到此事還是氣

35 參神田喜一郎之《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學 I——日本填詞史話上——》（東京，二玄社，1965），頁317—320。

36 《講話》的小說部分在論唐代小說（頁393，孫譯本頁353）和論《紅樓夢》（頁529，孫譯本頁476）時提到槐翁（即森槐南）。其後修訂本《支那文學概論》又說舊本承用槐南翁「譚詞小說」之名，今則改稱「通俗小說」（頁362）。

37 以上見《講話》頁393至394（孫譯本頁353至354）。

38 《講話》頁394（孫譯本頁354至355）。

39 按《史略》歸入「雜俎」類的作品，《四庫全書提要》則分入「雜事」類（如《雲溪友議》）和「瑣事」類（如《杜陽雜編》、《酉陽雜俎》）。

40 按《史略》論唐代小說，第八、第九兩篇論傳奇文，第十篇論傳奇集及雜俎。至於《小說史大略》原將「唐傳奇體傳記」分作兩篇論述，所重在雜集成書而外之記傳。上篇述異聞，下篇述逸事，而異聞、逸事復各分為兩小類。

憤難平了。⁴¹

魯迅沒有整大本「剽竊」日本人的著作，但日本方面却有人剽竊魯迅的《史略》，那便是宮原民平的《支那小說戲曲概說》，大正十四年（1925）由東京共立社出版，這在辛島驍的一篇文章裏已提到過了。⁴²

五 《史略》的修訂與鹽谷溫的關係

魯迅不單在開始寫《史略》時參攷了鹽谷溫的《講話》，其後在1931年7月出版《史略》的訂正本，主要的改動都和鹽谷溫有着密切的關係。

鹽谷溫在中國小說戲劇研究方面的貢獻，《講話》之外，尤在於發現了一些在中國經已失傳的古本小說和戲劇，開拓了新的研究範圍。這包括日本內閣文庫藏的元刊《全相平話》五種、《古今小說》四十卷、《喻世明言》二十四卷、《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另宮內省圖書寮（即宮內書陵部）藏的元人雜劇《西遊記》六本。此外又根據《舶載書目》而知道有《警世通言》八本流傳日本。⁴³現在治中國小說的人都知道有所謂「三言」、「二拍」，而最先加以介紹考索的正是鹽谷溫。大正十五年（1926）鹽谷溫寫了一篇〈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いて〉，在《斯文》第八編第五、六、七號上連載。⁴⁴同年又在《改造》第八編第八號上發表〈明代の通俗短篇小説〉。後一篇只討論了《三言》、《二拍》，前一篇則於《三言》、《二拍》外，還討論了元人雜劇《西遊記》六卷和《全相平話》五種。鹽谷氏在發現吳昌齡的《雜劇西遊記》後，曾將全文在《斯文》第九編第一號上開始連載，至第十編第三號刊完。昭和三年（1928）再由鹽谷溫主持的斯文會印成單行本。至於《全相平話》五種之一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三卷，則由鹽谷溫私人出資於大正十五年（1926）影印刊行。又在昭和三年（1928）寫了一篇〈全相平話三國志に就て〉，收在《狩野教授還曆記念

41 詳見魯迅1935年12月31日作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

42 見辛島驍〈回憶魯迅〉，日文原載1949年6月東京出版的《桃源》創刊號。由任鈞譯成中文，登於《魯迅研究資料》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頁207—215。文中說：「恰好緊接着在東京出現《中國小說史略》，宮原民平氏也出版了《中國戲曲小說史概說》。儘管其中小說部分許多都是依據魯迅的《史略》，而在《序文》中卻並未提到此事，這使得我們青年學生都有些感到氣憤。」

今按該書第十七章《明の鬼神小説》、第十八章《明の人情小説》，從兩章之標題以至內容，幾乎全出《史略》，抄襲之迹至為明顯。其實該書亦有不少地方是採用鹽谷溫的《講話》的，而僅於唐代傳奇小說分爲四類聲明是引用鹽谷溫的說法（頁63）。

43 最先由《舶載書目》而知道有《警世通言》流傳日本的其實是他的學生長澤規矩也。鹽谷溫在〈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いて〉中已加說明。故鹽谷溫寫這篇文章時，其實亦未見《警世通言》。其後辛島驍在《斯文》第九編第一號（1927年）發表《警世通言》三種，對該書的版本始有較清楚的交待。

44 按《中國小說史略》注釋本頁3，注1引到鹽谷溫此文，將發表的時間誤作1924年。

支那學論蒙》裏。

鹽谷溫的文章，很快便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注意，1926年10月，馬廉便翻譯了《改造》上的那篇文章，題作〈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說〉，並且加上大量的按語，登載在《孔德月刊》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同年12月又在《語絲》第111期上發表〈關於白話短篇小說《三言》《二拍》〉，其後孫俚工在翻譯《講話》一書同時，又譯出了鹽谷溫在《斯文》上發表的〈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和〈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⁴⁵收作1929年出版的《講話》譯本的附錄。鹽谷氏在這些文章裏一再提到魯迅沒有看到流傳日本的這些珍貴的小說材料，對魯迅來說自是一種強烈的戟刺。1928年鹽谷溫到中國訪問，道經上海，曾和魯迅見面，是年2月23日的《魯迅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晚往內山書店……遇鹽谷節山，見贈《三國志平話》一部，《雜劇西遊記》五部……贈以《唐宋傳奇集》一部。⁴⁶

後來鹽谷溫在昭和二十四年（1949）出版的《中國小説の研究》的序中亦說：

邇來數遊禹域，一夕於上海與魯迅氏相會，就本書（按：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清談數刻，交換所見，不覺移時。⁴⁷

說的也是1928年的這次會面。⁴⁸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們今天雖然已無法知道，但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促使魯迅改訂《史略》的一種因素吧。

1931年的《史略》改訂本把原來第十四、十五兩篇敘述的主要內容對調了。原來第十四篇題作〈元明傳來之講史〉，內容是關於《水滸傳》和以後的續作。第十五篇題作〈明之講史〉，內容是關於《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北宋三遂平妖傳》以及其他明清講史的。改訂本則將第十四篇改題〈元明傳來之講史（上）〉，所論則為《全相三國志平話》、《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和《北宋三遂平妖傳》。而第十五篇則改題〈元明傳來之講史（下）〉，其中論《水滸傳》和以後的續作各節，與原來的第十四篇大致相同，⁴⁹然後才接上原來第十五篇〈明之自開闢至兩宋史事平話〉和

45 按〈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原載《斯文》第八編第九號。當時是當為鹽谷溫作的。實際準備此表的恐怕是長澤規矩也。但長澤氏早期的文章如〈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引用此表時也曰為鹽谷溫作，如今此表又收到《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五卷裏去了。

46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頁665—666。

47 《中國小説の研究》頁1。

48 魯迅與鹽谷溫的會面只此一次。但早在1926年二人已開始通信，並且互贈書籍了。（參1926年8月9日、8月17日及1928年2月18日《魯迅日記》。）

49 關於《史略》各種版本的改訂問題，以陸樹勳的〈略談《中國小説史略》版本上的一些問題〉論述較詳，可參看。

〈清之統絃及訂補〉兩節文字。《史略》之論元明講史，本來是先《水滸》而後《三國》的，這是因為《水滸》故事可追溯到《大宋宣和遺事》去。不過元雜劇中雖有演《水滸》故事，但《水滸》以小說形式出現，最早只有晚明的刊本。如今既然發現了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就小說發展史言，自然不能不先論《三國》而後論《水滸》了。

改訂本《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主要是參攷了鹽谷溫的〈關於明的小說《三言》〉和〈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而改寫的。魯迅其實未嘗見《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以及《二刻拍案驚奇》，所以只能轉述他的意見。至於鹽谷溫校印的吳昌齡《雜劇西遊記》，魯迅在改訂本第十六篇中只是略作介紹而已。

最後，我們還要討論一下魯迅的《史略》對鹽谷溫的影響。

就學術競賽言，《史略》的出現，取代了《講話》在小說研究方面領先的地位。其後鹽谷溫從內閣文庫藏書中發見元刊《全相平話》，《古今小說》等天壤間罕本，寫成研究論文，震驚學界。在新材料面前，魯迅不得不重新改訂《史略》。而改訂本《史略》亦於1935年譯成日文，鹽谷溫的《講話》改訂本《支那文學概論》，又反過來接受了《史略》的一些看法，改正原有的錯誤，擴大討論的範圍。這在論唐人小說一節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唐人小說的材料，《講話》原據《唐人說薈》，至是改用《太平廣記》，而稱《五朝小說》、《唐人說薈》（一名《唐代叢書》）等為明清間的俗書，⁵⁰修訂本除將舊版論及後世偽託之作刪去外⁵¹，又於神怪類中補絃《古鏡記》和《補江總白猿傳》，並對部分傳奇的作者問題加以更正，⁵²這全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此外，在討論漢代小說時又效法《史略》增加論述《西京雜記》的部分。⁵³

這些修訂，並沒有影響《講話》原書的架構，只可說是鹽谷溫採納了魯迅的意見，補正了原書因疏於考證而引致的一些闕失。不過《講話》其他部分的增訂，或出於鹽谷溫一己研究的成果，或介紹新材料的發現，或參攷魯迅以外其他發學者意見，卻有超越《史略》的趨勢。

《講話》的修訂本《支那文學概論》，最重要的增改還是在通俗小說方面。

宋以後的通俗小說，鹽谷溫原據森槐南稱作「渾詞小說」⁵⁴，修訂本在論通俗小說

50 見《支那文學概論》頁318。

51 《支那文學概論》以《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出宋人依託。

52 如《虬髯客傳》原據《唐人說薈》作張說撰，今改據《太平廣記》作杜光庭撰。他如《紅線傳》舊作楊巨源撰，今作袁郊撰。《杜子春傳》舊作鄭還古撰，今作李復言撰。《枕中記》舊作李泌撰，今作沈既濟撰。《周秦行記》舊作牛僧孺撰，今作韋瓘撰。皆據《太平廣記》改。

53 見《支那文學概論》頁310。

54 同前，頁362。

之前，增加了〈燉煌發見の俗文學〉為第四節，誠如鹽谷氏所說，「由於燉煌寶庫的發現，俗文學的源流變成可以追溯到唐末去了。」⁵⁵他稱讚鄭振鐸所著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對燉煌的俗文學特筆大書，開拓前人未到之境，為中國文學史劃一新紀元。⁵⁶如今《支那文學概論》新加的這一節文字，顯然是參攷了鄭著第三十三章〈變文的出現〉的意見。至於魯迅的《史略》，自初版以來，僅於第十二篇〈宋之話本〉的開頭用短短兩段文字介紹這些「俗文」，一直未加增訂。魯迅曾經批評鄭振鐸缺乏史識，⁵⁷就探求變文與通俗小說的關係言，恐怕有欠公允。

修訂本第五節〈通俗小說〉，較之原來的《講話》增加了第二項〈全相平話〉和第四項〈三言兩奇·今古奇觀〉。原來第一項〈譚詞小說的起源〉至是亦擴大為〈通俗小說の起源と其の發展〉。

首先要討論第一項。《講話》只討論了《人宋宣和遺事》、景宋殘本《五代平話》和《京本通俗小說》。改訂後則補敘《五代史平話》中梁史的序論已提到三國時的曹操、孫權、劉備是漢初三個功臣韓信、彭越、陳豨托生，元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則祖述此說，其後又敷衍成《古今小說》中的一篇〈關陰司司馬斷獄〉。這樣的歷史考察，是魯迅的《史略》所沒有的。

至於《京本通俗小說》的成書年代和真偽問題，長澤規矩也寫過一篇〈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由東生譯成中文，登在《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六號（1929年6月）上。魯迅大抵不會沒有看過這篇文章，⁵⁸可是這篇文章的攷證方法還沒有到家。⁵⁹1931年，鄭振鐸在《小說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七期發表〈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上）〉，亦將《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所刻話本加以比較，結論是《京本通俗小說》那樣編次井然、內容純粹的「話本集」，決不可能在明嘉靖以前出現。⁶⁰魯迅是相當注意版本

55 同前，頁357。

56 同前，頁356。

57 按1932年8月15日魯迅致臺靜農信中云：「《中國小說史略》而非斷代，即嘗見貶於人。但此書改定本，早於去年出版。……雖曰改定，而所改實不多，蓋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時時介紹於中國，但尚無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鄭君所作《中國文學史》，頃已在上海豫約出版。我曾於《小說月報》上見其關於小說者數章，誠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其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頁319）

58 魯迅留心《小說月報》上關於小說研究的論文，已見注57所引致臺靜農信。而改訂本《史略》還引用了《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十號鄭振鐸的〈三國志的演化〉一文。

59 長澤氏在文中除證明了葉德輝刊行的《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金瓶梅詞話》為偽作外，本亦懷疑繆荃孫刊於《檀書東堂小品》中的《京本通俗小說》七卷可能是《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中若干篇的改裝。但與內閣文庫所藏的《清平山堂》殘本小說比較之後，又說那不是明末以後的偽作。

60 見《小說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七號，頁1942。

問題的，他因為懷疑《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並非宋本，曾經和日人德富蘇峯展開筆戰。⁶¹但在討論《京本通俗小說》時，卻沒有參攷別人已做的考證工作，仍舊含糊地當作是真的宋人話本，放在所謂「擬話本」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前來論述，不能不說是《史略》的一大缺憾。後來長澤規矩也又寫了〈京本通俗小說の眞偽〉一文，⁶²始斷言那是出於繆荃孫「戲作」，鹽谷溫修訂《講話》時雖仍將《京本通俗小說》當作宋代話本來討論，但已附帶說明有人以為那是全出清人偽作，⁶³總算是對當時學術界的意見作了一點交待。

撇開偽作的《京本通俗小說》不談，「清平山堂」所刻話本實為傳世最早的話本集。最先由長澤規矩也於內閣文庫中發現，並加介紹。⁶⁴北平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亦曾於1929年據內閣文庫藏本影印行世。但是1931年的改訂本《史略》對這樣重要的小說材料却隻字不提。鹽谷溫修訂《講話》時，在討論《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前，不但介紹了內閣文庫藏「清平山堂」所刊話本十五篇，還介紹了馬廉所發現的《雨窗》、《欹枕》集十二篇，⁶⁵這都是舊版《講話》所沒有的。

根據長澤規矩也〈最近約十年間に我國で發見された支那戲曲小説研究の資料〉一文，元刊本《全相平話》五種其實是由鹽谷溫的學生辛島曉在內閣文庫發現的⁶⁶。至於鹽谷溫所寫的一些關於《全相平話》的論文，已於上文介紹過了。魯迅在改訂《史略》時只看過《三國志平話》，而鄭振鐸則有幸全部讀過，並且於1931年寫了一篇相當詳細的論文，題作〈論元刊全相平話五種〉，登在《北斗》第一卷第一期上。⁶⁷1935年《史略》出第十版，魯迅又做過輕微的修訂，但對新發現的小說材料和有關的研究則一概沒有採納。至於鹽谷溫在修訂《講話》時所增加討論《全相平話》的部分，較之舊文尤見精彩，自是《史略》所無法比擬的。

《講話》另一重要增訂，要算增加〈三言兩奇，今古奇觀〉一項。內容較之〈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て〉等舊文又有增益。並且還引用了孫楷第的〈三言二拍源流考〉。⁶⁸孫氏此文發表於1931年4月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二號。（其後收入《滄州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頁149—207）那時孫氏已知道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

61 可參《華蓋集續篇·關於三藏取經記等》及《二心集·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板本》二文。

62 見《書誌學論考》（松雲堂書店，1937）頁147—153。又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

63 見《支那文學概論》頁369。

64 即〈京本通俗小說と清平山堂〉一文。

65 包括《雨窗》、《欹枕》集的所謂「清平山堂話本」，其實正名當為《六十家小說》。可參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頁89—91。

66 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頁165。

67 現收入《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407—423。

68 見《支那文學概論》頁419。

藏有明尚友堂刊《拍案驚奇》四十卷原本了。而1935年的《史略》第十版還是停留在三十六卷的階段。

綜觀鹽谷溫對《講話》小說部分的修訂，受魯迅的影響其實並不太多。修訂本只有兩處直接提到魯迅的名字。一是關於《水滸傳》版本問題的意見，一是只見於《史略》的《續今古奇觀》的卷數問題，⁶⁹不過都是無關重要的。

六 小 結

五四時代的中國作家，作品譯成日文的，以魯迅、周作人兄弟為最多。而關於文學研究的著作，在1949年之前譯成日文的，亦不過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源流》數種而已。⁷⁰其中以《史略》的學術價值最高，影響也最大。

五四時代中國作家所受的日本影響，已是一個引起廣泛注意的論題。魯迅的成功，和他在日本的八年留學生活有莫大的關係。他不但學習日本文化，而且更通過日文的著作和翻譯得到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日本留學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已是不爭的事實。對中國而言，日本可說是西方文化的媒婆。

日本模倣西方，中國模倣日本，在五四初期學術上「模倣的模倣」而卓然有成的，於《史略》而外，確然並不多見。誠如《史略》的序言所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史略》有他歷史的光輝，但在新的小說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面前不免要顯得暗淡。而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者至今還沒有勇氣對《史略》加以批評，甚至執着魯迅說過的一言半語，盲目貶低和魯迅同時的其他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除令我感到惋惜外，也是促使我寫作本文的原因之一。⁷¹

我從研究《史略》而注意到鹽谷溫的《講話》和那部流傳不廣的《講話》修訂本（即《支那文學概論》），才發覺鹽谷溫影響魯迅最大的學術見解竟是來自德國的漢學家，這是指小說源於神話傳說這一點。但是August Conrady早於1906年已注意到印度神話對中國的影響，我國研究古代神話的人注意及此的至今仍沒有幾個。我們都知道印度古代有極其豐富的神話故事，既然在公元前400年中國已有源自印度的月兔故事，這個中國版本的內容開始時理應不會過於單薄。何以沒有好好的流傳下來呢？魯迅

69 分別見於《支那文學概論》頁386，頁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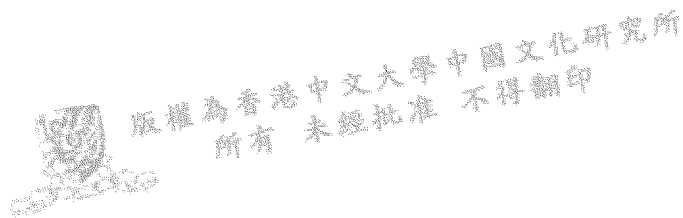
70 參《日本訳中国書綜合目錄》（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編號920.036，920.764，920.129。

71 如許懷中的《魯迅與中國古典小說》，算是國內研究《史略》字數最多的一本書，但對《史略》並無半句批評。馬幼垣的《論〈中國小說史略〉不宜注釋及其他》一文，可說是海內、海外僅見的用中文寫的公允地批評《史略》的缺點的論文了。




在《史略》提出「人神殺雜」的解釋是欠缺說服力的。我以為這些來自印度的神話故事或其他一些中國本土的神話故事最初大抵只在口頭流傳，這些「口頭文學」沒有好好的保存下來，主要是中國文字太難。中國古代的一切書面紀錄都力求簡鍊，是不宜記載長篇的史詩一類的神話故事的。

就學術的影響言，August Conrady影響鹽谷溫，鹽谷溫影響魯迅，魯迅的《史略》再反過來影響鹽谷溫和其他日本讀者，就五四時期的學術著作言，這種例子是極其罕見的。不過中國的文人學士通過日本而轉賣東洋裝的德國貨，我以為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當有不少，（最明顯的，莫如創造社提倡「革命文學」的理論基礎。）而且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From August Conrady to Shionoya On to Lu Hsün —
A Study of Literary Influence Focused on Lu Hsün's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A Summary)

Chan Shing Cheong

Lu Hsün 魯迅 (1881-1936) is better known to the general reader as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than as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t was his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中國小說史略, Peking, 1923-24)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serious research in the field by a Chinese scholar. This work, however,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Shionoya On's (1878-1962) *Shina bungaku gairon kōwa*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Tokyo, 1919) especially in its view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fiction, which Shionoya On believed to be myths and legends. Although a similar view had already been expressed in Tsubouchi Shōyō's 坪内逍遙 (1859-1935) *Shōsetsu Shinzui* (小說神髓, Tokyo, 1885), we have no doubt that Shionoya On's view was derived from the German Sinologist, August Conrady (1864-1925).

Germanism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fac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 Meiji period sent more students to Germany than to any other Western country. Shionoya owed much of the success of his *Kōwa* to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German Sinologist's Western approach to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ts emphasis on popular genres such as drama and fiction. More than one third of Shionoya's book was devoted to a treatment of Chinese fiction, a subject hardly touched on previously by Japanese Sinologists with a traditionalist approach.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Lu Hsün's *Brief History* was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German scholarship through Shionoya's *Kōwa*. Furthermore, Lu Hsün had to revise and update the sources of his *Brief History* in 1930 since some important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s had newly been discovered by Shionoya On himself in the Japanese imperial libraries. To redress the balance, Shionoya On also adopted some of Lu Hsün's arguments in the *Brief History* when he revised his *Kōwa* in 1942. This article is a preliminary attempt at investigating this rare case of mutual literary influence between a Chinese and a Japanese schola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